

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是哲学职业的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

曹剑波*

内容摘要:最近实验哲学的研究证明:无论是关于葛梯尔型案例的知识归因直觉、汉字小屋案例的智能判断直觉,还是关于小提琴手案例的道德判断直觉以及兼容主义的道德理论直觉,这些哲学直觉都是有性别差异的。与此相应,哲学职业存在着普遍的性别差异的现象。我们认为,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哲学直觉更接近主流哲学家的直觉,这是哲学职业中的男性多于女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哲学直觉;性别差异;实验哲学

哲学直觉是关于哲学命题真假的自发判断。对这种判断,人们一般不能提供进一步的理由。在哲学论证中,哲学家通常会借用在直觉上明显的假设作为前提。诉诸哲学直觉是哲学论证不可或缺的方式,哲学直觉在哲学论证中的作用类似于观察在科学理论中提供证据的作用。正如索萨(Ernest Sosa)指出:“直觉在知识论和在哲学中被期望起作用的方式,通常更普遍地……类似于在经验科学中观察被期望起作用的方式。”^①最近10年新兴的实验哲学运动强调对哲学直觉的实验研究,其大量的研究表明,包括知识归因直觉、智能判断直觉、道德判断直觉和道德理论直觉在内的许多哲学直觉,都是有性别差异的。我们认为,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是哲学职业中女性偏少的重要原因。

一、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

最近10多年出现的实验哲学研究表明,哲学直觉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哲学直觉更偏离主流哲学家的直觉。下面仅以知识归因直觉、智能判断直觉、道德判断直觉和道德理论直觉为例加以说明。

* 作者简介:曹剑波,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知识论、实验哲学、女性哲学等。

① Ernest Sosa,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7 (132):107.

(一) 知识归因直觉的性别差异

在《知识是主观的吗？成人认知直觉的生理性别差异》^①中，斯塔曼斯(Christina Starmans)和弗里德曼(Ori Friedman)提到了2个类似葛梯尔案例的实验研究。受试者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本科生。在第一个实验中，人数共140人，其中84名男性，56名女性。受试者阅读了下面手表/书本葛梯尔型的思想实验：

彼得在他锁上门的公寓里看书。他想洗个澡，于是把书放在茶几上。接着，他取下手表，也放在茶几上，然后就走进了浴室。当彼得开始洗澡时，一个窃贼偷偷地溜进了彼得的公寓。窃贼取走了彼得的手表，在原来的位置换上了一块廉价的塑料手表，然后离开了。彼得只洗了两分钟，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在第二个实验中，受试者共112人，其中54名男性，58名女性。他们阅读了戒指/餐叉葛梯尔型的思想实验：

苏想下厨。她取下结婚戒指，放在桌上，靠近一把不洁净的餐叉旁。她发现没有洗碗液了，于是就锁上她的公寓，到楼下商店去买。苏的邻居欧内斯特有点怪癖，喜欢通过窥视孔暗中偷看苏。当苏走后，他撬开锁进到她的公寓，拿走了她的结婚戒指，并换上了从口香糖机(gumball machine)那里取得的廉价塑料戒指。他锁上她公寓的门，返回家。苏只走了5分钟，现在她正在回家的路上。

读完后，为确定受试者是否理解了故事的细节，实验者问了受试者三个理解检测题。然后，又问：

彼得真的知道茶几上有一块手表，还是只是相信它？

苏真的知道桌子上有一个戒指，还是只是相信它？

结果发现：与男性受试者相比，女性受试者说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其中男性认为手表/书本葛梯尔型案例和戒指/餐叉葛梯尔型案例是知识的分别为41%和36%，女性分别为71%和75%。实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回答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否认葛梯尔型案例中的主角拥有知识，这与主流知识论的观点一致。

(二) 智能判断直觉的性别差异

塞尔的汉字小屋思想实验^②已在哲学和认知科学文献中被广泛讨论，并加入到了

^① Christina Starmans & Ori Friedm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s knowledge subjective? A sex difference in adults' epistemic intuitions, Post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Society, San Antonio, TX. (October, 2009).

^② John R.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80(3): 417~424.

入门教科书中。在《社会性别与哲学直觉》^①中,巴克沃尔特(Wesley Buckwalter)和施蒂希(Stephen Stich)对汉字小屋案例进行实验研究,探讨性别因素对智能判断的影响。受试者共127人,其中54名男性,73名女性。在测试中,提供给受试者一个思想实验,并问了一个检查理解力的问题和一个测试问题后,要求填写一个短的、8个项目的人口问卷^②。在结果的讨论中排除了这些人的数据:上过任何哲学课程;母语不是英语;简单的理解检测出错;回答问题时间少于30秒;IP地址不在美国。他们要求受试者阅读以下版本的汉字小屋案例:

珍妮以英语为母语只会讲英语。她被锁在一个装满成箱汉字的小屋里,并与一本使用这些汉字的用英文书写的说明手册在一起。屋外的人递进写了汉字的字条,上面写了珍妮不认识的汉字,它们是用中文写的问题。珍妮的工作是查手册,直到她发现这些看上去酷似写在纸片上的汉字为止。当她找到了这些字符串时,手册会告诉她写下了什么新的字符串,并送给屋外的人。

按照手册的指示,珍妮能够给出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珍妮和她使用的手册组成的这个系统可以被认为是一台不寻常的计算机。在屋外说中文的任何人看来,珍妮擅长按照手册的指示办事的反应,很难与那些会说中文的人的反应区分开来。

在作过理解测试后,受试者被问他们是否同意下面的句子:“珍妮和她的手册组成的计算系统理解写在字条上的中文。”

采用7点评分制,“1”表示“完全不同意”,“4”表示“在两者之间”,“7”表示“完全同意”。结果是:男性得分为4.13,女性得分是3.25,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同意计算系统理解写在字条上的中文。

(三)道德判断直觉

“小提琴手案例”最初由汤姆森^③在关于堕胎的道德判断的广泛讨论中提出的。受试者共298名,其中176名男性,122名女性。实验为受试者提供了如下“小提琴手案例”:

一天早晨,吉尔醒来,发现在她床边有一名陌生的男子与她的肾相联。一位音乐爱好者协会的男子向吉尔介绍他自己,并解释说,她已经与一位著名的小提琴手相联,这位小提琴手因肾功能衰竭快要死了。没有吉尔的帮助,小提琴手就会死。这个协会的男子解释说,为了让小提琴手康复和幸存下来,吉尔必须在9个月内一直与小提琴手相联。吉尔拔出插头,小提琴手死了。

① Wesley Buckwalter & Stephen Stich, Gender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http://philosophy.ucsd.edu/_files/ncartwright/phil152/gender-and-philosophical-intuition.pdf

② 8个项目的人口调查问卷收集有关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哲学训练、母语、种族、宗教和收入水平的信息。

③ Judith Jarvis Thomson, A defense of abortio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71(1:1):47~66.

受试者被要求从1到7对“吉尔拔插头”的行为给予回答，“1”表示“禁止”，“4”表示“允许”，“7”表示“必须”。结果发现，男性更可能说吉尔拔插头是允许的，而女性则倾向于认为这个行动是禁止的。男性受试者的平均值为4.32， $SD=1.39$ ；女性受试者的平均值为3.86， $SD=1.57$ ， $d=0.31$ 。有一个独立样本t检验揭示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 $t(296)=2.65$ ， $p<0.01$ 。^①

(四)道德理论直觉

在《为什么男性是不兼容主义者?》^②中，霍尔茨曼(Geoffrey Holtzman)对道德兼容主义思想实验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受试者共192人，其中102名男性，90名女性，受试者读到了如下兼容主义的思想实验：

假设科学家计算出宇宙大爆炸时的准确状态，并找出所有的物理规律。他们把这些信息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完美地预测了已经发生过的一切。换句话说，他们证明，因为物理学规律和已经发生的一切，因此所发生的一切必定准确地那样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谋杀某人吗？

结果发现，男女受试者之间的反应有非常大的差别：有63%的女性回答说在所描述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谋杀某人；只有35%的男性给出了兼容主义的回答($d=0.58$ ， $p<0.05$ ，费希尔精确检验，所有实验都是双尾的)。

在我们所做的知识归因直觉、认知确证直觉、道德认知直觉、指称判断直觉、意识判断直觉等系列调查研究中，有时也会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有时则没有。我们认为，基于严格的设计，在消除了可能的顺序效应、语言歧义、语境暗示、设计不合理、受试者不认真等不足之后，实验数据所揭示的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时实验重复不出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并不能提供合理的理由否认哲学直觉性别差异的存在。相反，这表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是微妙的、复杂的、难以预测的。

二、哲学职业的性别差异

调查数据表明，哲学职业存在着普遍的性别差异，哲学职业中女性普遍偏少。

2009年11月，查默斯(David Chalmers)等人通过网上问卷，调查了超过29个国家的3226位哲学系教师或哲学研究生，在说明了性别的3013人中，有2525位男性和488位女性，女性比例占总人数的16.2%。^③

2010年3月，巴克沃尔特和施蒂希对排名前20位的美国大学哲学系进行调查，调查哲

^① Wesley Buckwalter & Stephen Stich, Gender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http://philosophy.ucsd.edu/_files/ncartwright/phil152/gender-and-philosophical-intuition.pdf

^② Geoffrey Holtzman, Why are men incompatibilists? (in preparation).

^③ Available at <http://philpapers.org/surveys/>.

学系教师职称的性别比:女哲学教师的比例为 19.8%。其中女哲学教授的比例为 16.3%,女哲学副教授的比例为 27.6%,女哲学助理教授的比例为 30.7%;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哲学系中,女教师比例为 25.4%,英国哲学系 22.3%是女性。^①

2012年7月,我们对全国39所“985”高校工程大学和71所本科招生中有哲学专业的哲学系或哲学学院网站中的男女哲学教师进行了调查,统计了40所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资料,结果为:女教师人数占全体教师的21.5%,女教授占全部教授比例的13.4%,女副教授占全部副教授比例24.3%,女助理教授占全部助理教授比例36.4%。^②

2014年4月2日,我们统计台湾12所哲学系(所)网站上公布的专任师资的男女比例,结果为^③:女教师总人数为28,其中女教授为5人,女副教授为12人,女助理教授为11人;男教师总人数为103,男教授为41人,男副教授38人,男助理教授24人;女教师人数占全体教师的21.4%,女教授占全部教授比例的10.9%,女副教授占全部副教授比例24.0%,女助理教授占全部助理教授比例31.4%。

2014年5月3日,我们统计了香港10所高校^④中4所有哲学系的大学网站上公布的专任师资的男女比例^⑤,结果为:女教师总人数为5,其中女教授为0人,女副教授为3人,女助理教授为2人;男教师总人数为52,男教授为16人,男副教授16人,男助理教授20人;女教师人数占全体教师的8.8%,女教授占全部教授比例的0%,女副教授占全部副教授比例15.8%,女助理教授占全部助理教授比例13.0%。

三、思维方式的性别差异、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 与哲学职业的性别差异的关系

对于哲学直觉中的性别差异,我们可以用思维方式中的性别差异来解释。对于哲学职业中女性偏少的现象,我们可以用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来提供部分解释。与国外研究哲学的女性比例相比,中国哲学界研究西方哲学的女性比例更小,这一事实为用思维方式的性别差异来解释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并用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解释哲学职业的性别差距的合

① Wesley Buckwalter & Stephen Stich, Gender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http://philosophy.ucsd.edu/_files/ncartwright/phil152/gender-and-philosophical-intuition.pdf

② 要注意的是:(1)没有统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非哲学系的研究哲学的老师,如果马克思主义学院中有哲学系,则有统计;(2)哲学学院或心理学院中的心理学系的老师没有统计;(3)师资博士后没有统计进来;(4)个别学校中网站哲学教师的性别或职称查不到的没有统计;(5)兼职的老师没有计算;(6)在网上查不到职称、性别信息的老师没有统计;(7)有些哲学系打不开,故没有统计。不可否认,有些哲学系(院)网络更新不及时,资料可能有错误,我们也就只能统计这些错误资料了。

③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减少统计工作量,没有统计客座教师、合聘教师、兼任教师、约聘教师、荣誉教师和退休教师。在统计过程中,不少学者的性别没有明确标明,为了准确性,向台湾哲学学会现任会长米建国教授作了请教,特此感谢。

④ 澳门有5所高校,都没有哲学系。

⑤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减少统计工作量,没有统计客座教师、合聘教师、兼任教师、约聘教师、荣誉教师和退休教师。并把高级讲师计入副教授中,把讲师计入助理教授中。

理性提供了证明。

(一) 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源于男女思维方式的差异

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源于男女思维方式的差异。男女思维差异为生活经验所证实：女性思维主要是感性的、情感的、形象的、定性的、发散的、跳跃的，等等。男性思维主要是理性的、思辨的、抽象的、定量的、收敛的、连贯的。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不擅长逻辑思维，不擅长辩证思维，不擅长系统思维，更关注技巧而无视战略，更注重眼前而忽视长远，更重视微观而轻视宏观，更看合情因素而小看合理因素，更擅长把握现象而不擅长认识本质，更偏爱接受、传播和享用而不热心批判、探索和创造。我们的调查也证实：女性更情绪化，男性理性能力更强。^①

用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解释以上不同案例的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例如，(1)在两个葛梯尔型案例中，与男性相比，女性认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更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普遍地更情感化，比男性更容易采纳他人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较少能得出知识三元定义所蕴涵的结论即“主角只是相信”。(2)在中文小屋案例中，与男性相比，由于女性以定性思维为主，更重视微观，更注重眼前的生活，更难进行假设，更难把计算系统看作是一个整体，因此更难认同计算系统理解写在字条上的中文。(3)在“小提琴手案例”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倾向于禁止“吉尔拔插头”，是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重情感，更关爱生命。(4)在兼容主义的思维实验中，女性更倾向于兼容主义，男性更倾向于不兼容主义，这是因为男性的逻辑思维和连贯思维与不兼容主义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女性的情感思维和跳跃思维与兼容主义相一致。实验哲学发现的其他案例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也可以用类似的原因来解释。

(二) 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是哲学职业中女性偏少的重要原因

实验数据表明，哲学直觉是有性别差异的，与男性的哲学直觉相比，女性的哲学直觉更偏离主流哲学家的直觉。诉诸哲学直觉是哲学论证的重要方式，是构建知识大厦不可或缺的根据。女性的哲学直觉与主流哲学家的直觉的偏离，一方面会使女性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因其直觉答案与“标准答案”不符，会导致她们的不安、困惑，甚至产生挫折感，认为自己不擅长哲学，从而放弃哲学；另一方面，在严格的晋级考试筛选中，女性的直觉答案与“标准答案”的不一致，会导致较高的淘汰率。

经验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国内哲学系本科生招生中，存在有女生比例大于男生的现象；而在哲学系硕博研究生招生中，男生比例则大于女生比例。我们统计了1998—2012年厦门大学哲学系招生情况：这15年中，共招本科生601人，其中男生人数259人，女生人数342人，女生占56.9%；招收硕士生共372人，其中男硕士生192人，女硕士生180人，女硕士生占

^① 2012年6月，我们对厦门大学哲学系1~3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61人，男性为22人，女性为39人。采用7点评分。在性格特点调查题中，“1”表示“很情绪化”，“4”表示“适中”，“7”表示“很理性”。结果是：男性的平均分为4.36，女性为3.72。在理性能力调查题中，“1”表示“很差”，“4”表示“适中”，“7”表示“很强”。结果是：男性的平均分为5.00，女性为4.33。在随后的2年多里，另调查的1352人中，其中男性为482人，性格特征和理性能力的总趋势仍旧不变。

48.4%；招收博士生178人，其中男博士生126人，女博士生52人，女博士生占29.2%。女本科生、女硕士生和女博士生所占比例依次减少，可以用标准直觉的“过滤器”对女生的淘汰来说明。

以上现象在国外大学选课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自罗格斯大学过去10年上哲学课程的性别比例数据表明：选修水平为100的入门课程，男女学生的百分比几乎相等，其中男性为53.8%，女性为46.2%；随着水平的提高，女性的百分比依次下降，在200水平的课程中，女性为40.38%；在300水平的课程中，女性为36.50%；在400水平的课程中，女性为29.31%；在500~800水平的研究生课程中，女性为26.2%。^① 英国哲学协会通讯(British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2010的调查显示：在哲学系中，女本科生为45%，女硕士生为35%，女博士生为30%。^② 在美国哲学系中，女硕士生与女博士生没有多大差异，其比例在29%~30.8%，与英国的女博士生比例相同。^③

不可否认，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绝不是解释哲学领域女性偏少的唯一原因。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通常也是哲学领域女性偏少现象解释的部分原因，性别歧视和男性至上主义的态度和行为也是重要的因素。^④ 认识到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是产生哲学领域女性偏少的一个原因，这对我们最终实现男女平等不无帮助。

(三) 思维方式的性别差异与哲学职业中性别差异的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用思维方式的性别差异解释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是可行的，用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解释哲学职业中的性别差异也是有理的。因此，用思维方式的性别差异可以解释哲学职业的性别差异。心理学研究证明，思维方式不仅具有性别差异性，而且具有种族差异性。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类似女/男思维方式的差异。从哲学课程的设置、哲学专业的分类、哲学研究上，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哲学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中/西方哲学职业女性比例的相对接近，也许纯粹是一种巧合。真正反映中国哲学界研究哲学的男女比例的应该是研究西方哲学的男女研究者的比例。由于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思维有差异，女性的思维与男性的思维的差异与中西思维差异类似，再加上在整个哲学界研究哲学的女性比例偏小，我们可以推论出：在中国哲学界，研究西方哲学的女性比例更小。

为了验证我们的猜测，2012年7月，我们调查了国内11所985高校哲学专业设置健全的高校中外国哲学专业的男女教师比例。结果如下：外国哲学专业女教师总人数为5，其中女教授1人，女副教授3人，女助理教授1人；男教师总人数为65，男教授38人，男副教授19人，男助理教授8人；女教师人数占全部教师的7.1%，女教授占全部教授的13.6%，女副教授占全部副教授的24.3%，女助理教授占全部助理教授的12.5%。在中国的哲学系

^① Wesley Buckwalter & Stephen Stich, Gender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http://philosophy.ucsd.edu/_files/ncartwright/phil152/gender-and-philosophical-intuition.pdf

^② Unconscious Influences and Women in Philosophy, <http://www.shef.ac.uk/content/1/c6/03/49/18/BiasAndPhilosophy8.doc>

^③ Miriam Solomon and John Clarke, *CSW Jobs for Philosophers Employment Study*, APA Newsletter on Feminism and Philosophy, 2009(8;2):4.

^④ Sally Haslanger, Changing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philosophy: Not by reason (alone), *Hypatia*, 2008(23;2):210~223.

中,外国哲学专业女教师人数占全体外国哲学专业教师的 7.1%。这个比例不仅低于美国哲学系中女教师的 19.8%,低于英国哲学系中女教师的 22.3%,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哲学系中女教师的 25.4%,而且也低于中国哲学系女教师的 21.5%。中国著名大学中研究外国哲学的女性比例低于英美加澳等知名大学研究哲学的女性比例,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猜测的正确性,也反过来证明我们用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来解释哲学领域性别差异的正确性。^①

Gender Diversity in Philosophical Intuitions is the Main Reason of Gender Diversity in Philosophical Profession

Cao-Jianbo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show that these philosophical intuitions have gender diversity, which are intuitions of attributed knowledge about Gettier cases, intuitions of intelligence judgments about the Chinese Room case, intuitions of moral judgments about the Violinist case, intuitions of moral theories about compatibilism. Corresponding to it, there is universal gender diversity in philosophical profession. We think that comparing with women, men's philosophical intuitions is closer to mainstream philosopher intuitions, so it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the number of men is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women in philosophical profession.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gender diversity;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编辑:石红梅

^① 有位台湾学者曾提出:“在中国的哲学系中,外国哲学专业女教师人数比例偏低,你忽略了作为对比资料来源的西方大学研究哲学的女性,皆为英语系国家学者(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具有语言与文化上的优势,而中国女性哲学研究者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必须花费更多的研究时间克服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由于女性生育后代职责要花费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因此女性选择研究中国哲学而非外国哲学,亦有可能是根据时间与精力的投资报酬率所得的选项,因此可能是‘性别’和‘种族’双重因素导致的差异。”笔者完全不赞同用这位学者用双重差异说来解释“在中国的哲学系中,外国哲学专业女教师人数比例偏低”。笔者认为,中国女性研究外国哲学的比率更低,主要是因为中国女性与外国女性相比理性思维能力较差,与英美男性相比,理性思维能力更差。理由有:(1)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学语言的能力比男性强,因此,与中国女性相比,中国男性必须花费更多的研究时间克服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按此推理,研究外国哲学的中国女性比率应该比研究外国哲学中国男性要高。(2)的确,“女性生育后代职责要花费的大量时间与精力”。由于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高校女性通常只生育 1 个小孩,与英美国家女性通常生育多个小孩相比,所花费在生育后代职责上的时间与精力要少得多。据此推理,研究外国哲学的中国女性比率应该比英美国家女性研究自己国家的哲学的比较高。而调查结果并非如此。当然,需要承认的是,笔者没有调查英美国家女哲学家的生育率。如果英美国家女哲学家通常的生育率平均小于 1 个,那么笔者就应修正以上的观点。不过笔者认为,假定英美女哲学家的生育率与英美女性通常的生育率大体相同应该更合理。